

和谐发展
与公共经济管理改革

张占斌 著

中国式崛起

上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和谐发展
与公共
经济管理
改革

中国式崛起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式崛起：和谐发展与公共经济管理改革/张占斌著.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10 (2011 重印)

ISBN 978—7—80140—569—2

I. 中… II. 张…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749 号

- 书 名 中国式崛起 (上)
——和谐发展与公共经济管理改革
- 作 者 张占斌
- 责任编辑 任 燕
-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 编 辑 部 (010) 68929095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
- 印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开
- 印 张 24
- 字 数 336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80140—569—2
- 定 价 58.00 元

序

林毅夫*

从1978年底开始改革起，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路径，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避免了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中国的成功对将稳定、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视为成功转型前提条件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中国的经验证明：渐进的、实验性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优于全面的、自上而下的“休克疗法”。

在转型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都采用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系。通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僵化的微观管理单位这套传统体制，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才可能动员资源，建立起发展战略所选择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但由于这个经济体违背比较优势，效率很低。中国经济转型始于赋予微观单位部分自主权，由此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进行，传统的体制被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取代。

在此过程中，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于新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由于自主权的增加以及面对非国有部门的竞争，国有企业的效率也有所提高。原来的计划配置机制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逐渐失去

*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了支持，最终被废弃。转型过程中，国家、企业和民众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市场体系。因为经济在整个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大多数人能够在改革中获益。

采用“休克疗法”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也试图用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替代效率低下的计划体系。取消对私有企业的限制以后，立即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相对滞后而且进展缓慢。因而这些国家的企业构成与转型过程中与中国经济的企业构成是类似的。但是，中国的方法并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因此，中国的渐进方法取得了“休克疗法”所期望达到的正面效果，却避免了相应的成本。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转型成本和路径依赖性，中国的渐进式的改革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中国转型过程中总的经济绩效是可观的，但是中国的转型还没有完成。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管理体制和资源分配机制的改革，经济体系内部的制度安排出现了不一致。制度不相容导致转型过程伴随着寻租泛滥，投资过热以及通货膨胀。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宏观政策环境的问题以根除制度中的不相容因素，这样经济才能够开始持续平稳地增长。同时，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后，建立透明的、能够保护产权、激励创新、促进技术变迁以及国内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其产业就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其国民经济就可以得到最为快速、最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具有竞争优势，能够赚取最大的剩余，实现资本快速积累，使资本逐渐从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

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不仅产业会从劳动力相对密集型逐步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型，而且低收入者所拥有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值钱。所以，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既有效率，又能在生产过程的要素初次分配上就达到公平，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是因为较好地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才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收入水平赶上了发达国家，并且在收入分配上不断改善，避免了收入分配先恶化后改善的库兹涅茨倒 U 字形情况，创造了“东亚奇迹”。

如果不切实际地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过度密集的产业，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相对较少，大量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穷人就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同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没有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给予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不仅效率会很低，而且能够投资于这些产业的又必然是较为富有的人群，对这些产业予以保护和补贴，实质上就会形成低收入者补贴高收入者的倒挂情况。

违反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既会损失效率，在初次分配上也会丧失公平。投资于那些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产业的人群，还有动机去利用各种寻租手段向国家索取更多的保护和补贴，使国民经济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另外，也有可能出现像拉丁美洲有些国家的情况：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的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以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灵活的、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也就是：当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时，劳动力就相对便宜、资本就相对昂贵；将来劳动力变为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时，就转为劳动力相对昂贵、资本相对便宜。这样，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就会遵循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以更多地利用经济中相对丰富、相对便宜的要素，少利用相对短缺、相对昂贵的要素，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行相应的产业、产品、技术升级。

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在初

次分配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良好机制尚未形成，收入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这其中既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收入差距恢复性扩大，也有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如何根据比较优势的要求深化改革，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呢？

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当前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中小型企业。过去为了支持赶超产业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以能够支持大型企业发展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核心，民营中小企业很难从大银行和股市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而且在行业准入以及税收上与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相比仍然没有实现公平待遇。这些制度障碍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既减少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使得城乡二元结构难于消除。因此，应当完善金融结构，发展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并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消除影响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此外，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和推动技术创新上具有优势，我国应该参考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制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消除资源价格扭曲和不必要的行政性垄断。计划经济时代，为了保护 and 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发展，政府人为压低了资金、自然资源等投入要素的价格，并给予这些产业行政性垄断地位。直到现在，资金、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和行政性垄断还未完全消除，甚至诱发了寻租、腐败现象。因此，应尽快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价格扭曲和不必要的行政性垄断，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遵循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将会相当迅速，一、二、三产业的产品、技术会不断升级换代，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将流向城市二、三产业，而只有素质较高、有能力终生学习的劳动者才能适应这种动态发展的需要。过去我国教育事业相对落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摆在了突出位置。各级政府应当保障教育经费投入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并加强职业教育、在职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

保障社会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在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社会

上会有一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或因病、因灾需要社会给予照顾的人，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和个人就业转变中需要帮扶的人。对这些困难群体，除了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给予援助，也应该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传统美德，鼓励成功的企业和先富群体承担社会责任，伸出援手给予帮助。

前些年，张占斌博士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之后他到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从事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指导教师，我能够理解他的选择，希望他能够把理论研究与国家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国家发展做出经济学人自己的贡献。《中国式崛起——和谐发展与公共经济管理改革》是他在新工作岗位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了许多现实重大问题，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把自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考做了简要的归纳，是为序。

2007年5月

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章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1)
一、20 世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	(1)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态度	(7)
三、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系统思考	(11)
四、影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关键因素	(17)
五、政治经济力量的动态变化影响发展战略选择	(23)
六、痛苦的历史文化积淀里充满发愤雪耻的激情	(25)
七、采取比较优势的战略可能存有时间上的风险	(29)
八、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计划体制形成的关系	(32)
九、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	(36)
十、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国际视角解析	(40)
第二章 中国渐进式改革与经济转型的核心经验	(52)
一、试图破解“科尔内经济短缺难题”的探索	(52)
二、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视角下的经济关系	(55)
三、对计划体制的认识与对市场关系的理解	(58)
四、渐进改革开启了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道路	(62)
五、从“一边倒”到融入国际经济发展的海洋	(65)
六、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与混合经济的成长	(68)
七、中国特色的道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72)
八、国际比较：中俄两个大国的经济转型经验	(75)

九、中国经济转型核心经验的再提升和再验证	(78)
第三章 大国崛起经验与国家成长战略选择	(84)
一、中国未来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布局	(84)
二、和谐发展期盼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	(86)
三、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需要政府创新保障	(88)
四、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家的兴衰成败	(90)
五、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升	(92)
六、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竞争优势的关系	(94)
七、科技自主创新、企业价值与核心竞争力	(97)
案例：靠自主创新构建中国的科技“硅谷”	(101)
案例：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园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	(112)
案例：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保障	(122)
第四章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与统筹经济利益关系	(131)
一、渴求和谐经济关系与和谐经济关系建设	(131)
二、构建和谐社会与统筹协调经济利益关系	(133)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提升政府分配调控功效	(139)
四、宏观调控与政府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	(144)
五、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若干问题	(146)
六、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壮大公益慈善事业	(151)
七、欧洲国家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借鉴	(157)
案例：奥地利劳动就业和挪威社会保障动向	(161)
案例：重庆市梁平县梁山镇的和谐社区建设	(166)
案例：公益事业筹资与国家彩票管理改革	(172)

第一章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开展过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多有评论，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中国科学院胡鞍钢教授等都发表了很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较优势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有所不同，如何评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问题曾引起争论，未能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对复杂历史的梳理，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此问题再进行解析。

一、20 世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

近代以来，由于工业革命、商品贸易、资本输出、殖民掠夺、军事扩张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和凸显，世界各国在贫富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发达富裕国家和贫困落后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贫困落后国家和地区如何缩小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富裕国家和地区，困扰了许多的政治领袖和学界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欠发达国家陆续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在思考如何更快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问题。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首先要涉及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与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根据要素禀赋的实际来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如何选择。虽然

发展经济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提出了许多经验总结和理论框架，甚至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决策者，但实际上，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至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也没有都能够很好地完全解决，大多还处于发展的苦苦探索中。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感叹说：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新的解释。

20 世纪中后期，法西斯势力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类重新开始了新的发展探索。从历史发展的国际眼光来看，此前，工业化道路较有成就的国家大体有四条发展道路：一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从发展轻工业起步，逐步提高资本等要素积累，在资金等要素提升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同时，进行殖民掠夺和对外投资；二是美国农、工、商比较均衡发展，同时利用武力进行西进和海外扩张，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甚丰，加速经济成长；三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四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通过对经济实行国家的高度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当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 20 世纪中叶的时候，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是国际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使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了独立，在 17 世纪～19 世纪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掠夺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已经过去；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说明，德、日单单靠军事霸权地位并不能保证国家强盛地位的可持续，甚至使国家和民众付出沉痛的代价，靠武力的时代也成为历史；三是战后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虽然提供了很多贷款，但由于有许多约束条件，这对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事实上，对于相对落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是两条道路：一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的道路（剔除殖民掠夺和海外战争），基本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待资金等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转向发展重工业。实际上，就是循序渐进，逐步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如果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可能走向多种经济成分竞争共存的市场

经济体制。二是以前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为榜样，利用政权力量积聚要素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赶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军事威胁和侵略。如此则等于选择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选择赶超的发展道路。如果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可能走向国有经济“独霸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分野，主要在于相对落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而隐含在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对经济要素积累方式的选择差异。

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具有强烈的赶超愿望，激进主义的经济发展主张占有重要位置，而发达国家的凯恩斯政府干预思想的成功实践也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市场，由于这些共同的原因，不仅是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都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宏观政策环境的推行、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建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20世纪特别是中期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发国家都或先或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即经济赶超的战略，同时，为服从服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赶超战略，都逐步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可见，传统认为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后发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美好“愿景”。然而，有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经过多年的积累，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而少数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成为亮点，被誉为“东亚奇迹”，甚至是“东亚之谜”。

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四小龙”的成功和推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轨，很容易使人看不到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而将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社会制度的选择。林毅夫认为，这种不对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作细致的经济学分析，简单地将发展差异抽象为社会制度差异的结论是

经不起推敲的。第一，如果“四小龙”的成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为什么许多其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能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第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注定踟蹰不前，为什么最近 20 年的中国经济能够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并在沿海地区创造出比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时期更出色的经济奇迹？第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症结是社会制度问题，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制以后依然处在重重危难之中？

在考察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时，林毅夫等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取得成功。不仅中国、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赶超战略没有获得成功，一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获得成功，没有实现其赶超的愿望。例如，位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人均收入在 19 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目前仍处在经济上困难重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的不发达状态之中。在亚洲，20 世纪 60 年代曾被认为是仅次于日本的明日之星菲律宾，现在经济也处于混乱、停滞的状态。

对此，林毅夫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这种在经济发展上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更值得重视呢？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和劳动力的过剩以及技术的落后。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受压抑产业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不了资本积累。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的

保护政策（如金融支持、市场管制、贸易壁垒、财政补贴等）才得以生存，因此，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竞争能力和自生能力的。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矛盾并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引，相当大规模的人口长久处于贫困之中的状况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依赖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孤立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上自成体系，有很强的说服力。

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呢？新中国创建初，实行了较短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应当说，这个政策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也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实际。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比较优势原则没有坚持下去，而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当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战略”这样的提法，是后来人们的研究归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可以归结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如此归纳也能够讲得通。对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评价，无疑要涉及这个战略实施前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取向，理清这个问题将为我们的评价提供参照系和基本坐标。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中，较早就开始设计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发展方略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打好基础，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将来通过和平竞争和赎买的方式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应当说，这个体制类似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也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体制，它符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情，与工业化国家的一般发展规律比较一致，也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假设在不考虑国际环境和政治经济力量变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设计来发展经济，

对逐步提升国家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改善城乡关系，推动经济更稳、更快增长，无疑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可能会少走弯路，能够实现小步快走不停顿，国家实力的提升也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按照后发国家的要素禀赋实际，需要有个平心静气遵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过渡期”，“过渡期”的长短主要应当取决于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实际。也就是说，这个“过渡期”有可能相当长，但也有可能稍短些。但事实上，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根据偏好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要素的实际，还要考虑诸多非经济的因素，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因素中权衡，而动态的实践需求远比复杂的经济理论和静态模型更符合决策者的偏好，也似乎更被看重。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比较优势的战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选择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导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的因素很多，但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朝鲜战争爆发及其由此带来的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使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国际地位和国家前途备感忧虑，认为很难按照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和路径（比较优势）去实践。二是重工业强大的苏联给予全面的援助，在短期内使要素短缺的中国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使之有可能模仿苏联的模式发展前行，以求尽快避免国家安全危机，短期内实现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两个条件互为叠加、互为影响、互为推动。如果这两个条件缺一，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会沿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走下去。

但只要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无论怎样的社会制度，要素短缺的国家都容易内生出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不可能例外。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就等于放弃了市场体制，就要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度，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实际过渡和三大改造之所以都提前进行和基本完成，主要原因也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内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由此可以推出，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显然不是个单纯的经济理论分析和经济决策问题，而是更加复杂多元的价值评估后的取舍；虽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回应了当时中国军事和国防的特

殊需求以及决策者的政治和经济偏好，而作为人口和地域大国的中国与人口少和面积小的小国相比自然有其特殊性，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还是有些回旋余地，可以看成是比较现实和相对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在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的状况下，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由此加速过渡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最可能和最实际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头脑发热。这种选择既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又存在极大的历史局限。这种重大的历史作用在当时就有所显现，在后来也不能否定。但这种极大的局限在当时却是很难全面认识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体验和总结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极大的历史局限而否定它的重大历史作用，也不能因其重大历史作用而否定它的极大历史局限。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态度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预设，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因此，中国必须先完成工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提供前提。也就是说，工业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过程。“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前者是近代化或现代化学理论的概念，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毛泽东将两者统一起来了。这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即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途径，20世纪40年代时毛泽东更多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考虑，即通过确立一种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混合经济制度，推进工业的发展；还没有也不大可能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考虑。至少，从现有的文献看不出来，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人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发展战略的。这有些耐人寻味，一个以俄共为样板建立的政党，虽然确立的终极社会目标相同，但对革命之后社会制度的设计，对工业化路径的选择，似乎看不出多少苏俄革命的影响，倒是多少可以发现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工业化经验的影子。比如保护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通过不同经济成分的竞争，推动生产条件的改进和生活的改善，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刘少奇、